

• 非虚构面对面

巴蜀问答 •

• 理性与勇气

晃动的准星

· 邢军纪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最坚毅的朝圣者 •

• 清音可辨

不该让遗忘成为馈赠 •

• 长河漫漫静观天

晃动的准星

邢军纪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晃动的准星/邢军纪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033 - 2370 - 6

I. ①晃… II. ①邢…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591 号

晃动的准星

作 者: 邢军纪

责任编辑: 董保存 狄 敏

封面设计: 苏 馨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 66531659

E - 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370 - 6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灯下拾掇这些年的零星文章,犹拣一地鸡毛。岁月沉郁,生命就显得轻盈。将林林总总的论文和评论用《晃动的准星》命名,也足见笔者的飘移心态。这些年来,因教学和创作两手抓,在心意彷徨之间,所得甚少,但感触颇多。将这些碎片收集起来,更多的因由是对过往岁月的一份纪念。特别是卷三的一些文章,是一些领导和专家师长及朋友对本人作品的批评,我以感恩的心情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一是为了感谢,二是为了校正我创作中偏颇的准星,三是给自己一些自信。

——题记

目录

卷一：巴蜀问答

论战史文学	2
“二朱”比较	13
巴蜀问答	31
晃动的准星	37
新提文学含量问题	49
试论当代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可能性	57
乡土背景下的非虚构文学	65
歌颂式报告文学为何缺乏影响力初探	71
担当战神的缪斯	77
廿年改革风云人物之检索	95
在想象中与叶企孙先生的清华重逢	122
勇气与理性	136
创作课说明	146
创作论术语新解	149
我的文学观	159



卷二：清音可辨

一个共产党人的生命传奇	163
酒的诗学	168
令人称道的尝试	171
十年面壁不寻常	176
第四个台阶	179
海上作秀	187
另一种淑女生活	195
绿岛絮语	198
最坚毅的朝圣者	201
丁鹏的故事	205
天安门的文化舆图	208
我是一个作曲家	213
傅庚辰：记忆中的红色星辰	215
当兵的人	217
看山看水看建生	222
清音可辨	224
第八种色彩	227
绿色的承诺	229
一个雨天	233
重读王铁人	236
走在春风里	245

卷三：长河漫漫

《商战在郑州》序言	251
《中国精神》序言	253



《风雅大郑州》序言	257
《善莫大焉》序：让慈善普惠中华大地	259
胡振民：努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263
朱清：多出一些像《中国精神》这样的精神文明精品	270
田珍颖：郑州大写意中的文化追求	272
李炳银：“北中国太阳”的壮丽景象	276
李炳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79
刘茵：大郑州的文化抒写	282
张志忠：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冥	284
张志忠：关注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287
周政保：警示世人 呼唤绿洲	289
张志强：迷宫与圈套	291
黄献国：精神财富的拥有与发现	304
高海滨：中国精神的指路明灯	307
孙海霞：不该让遗忘成为馈赠	312
刘常：吾师、吾友	325
王凌硕：长河漫漫静观天	329
蓝月：绿叶对根的情意	332
杨鸥：邢军纪十年辛苦为大师立传	335
《风雅大郑州》研讨会十人谈	338
《中国精神》研讨会辑录	342
邢军纪教学科研及文学创作简介	346

卷一

巴蜀问答





论战史文学

——关于军事文学创新突破的思考

—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军事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坛上绝非是寂寞的，从《西线轶事》到《高山下的花环》，相当一批有才华的部队作家以他们富有影响的力作，在中国文坛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格局。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我们军事文学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期望值太大而所得较小。大量的军事文学作品只是题材的重复，人物的重叠，只是量的积累。想必是许多部队作家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所以，普遍感到了困惑和疲惫。

为什么出现这种文学现象？

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疏漏了这样一块相当广阔的领域——我们称它为战史文学。

所谓的战史文学，我们是这样界定的：它是建立在战争历史载体上的文学作品。它是经过诗化了的战争史，充满文学的主动精神，在历史观照、审美意识，哲学思辨的基础上，注入创作本体全方位的思考（包括引起战争和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民族心理、国家利益等等，种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矛盾和文学嬗变），也就是进行艺术的表现，从而为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为哪一个社会形态）揭示出进化的隐秘谶语，描摹出一条若隐若现，波澜起伏，从生发到消亡的昂扬而又悲壮的曲线。使人们在得到艺术享受的同时，感受到人类历史



的发展，延伸与超越。

这是一条苛刻的、难以描摹的曲线。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自然地，曾经为军事文学作家接近这条曲线提供了契机。但是，他们刚刚从硝烟中走到书桌前，耳中仍是兵嘶马鸣，眼前尽是“矢交坠兮士争先”的场景，想起倒下的战友，想起赢得这场战争的艰难，他们心中涌动着千般情感，百种心态。他们急于向人们诉说这一切，更由于年轻的共和国所面临的重重困难，需要在人民心中唤起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所以，他们倚马而作，写出了第一批军事文学作品。以《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文学发展的第一个浪潮。显然，这些作品就其审美价值而言，是比较浅表的，因为它更多的来自于共性的要求而不是个性的体现。当然，因为它们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文学的历史，用文学的形式再现了革命战争的威武场景，为人民提供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食粮，它们曾经并且还将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一个事实。

问题出在我们比诗人更富有激情的评论界。

我们的评论界一向比较功利。当他们看到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造出的一个个高大威武的偶像式的英雄竟然轻而易举地赢得我们人民的第一声喝彩时，便匆忙地丢掉平时的冷峻和矜持，丢掉了哲学的思辨，性急地给予了悲剧性的弘扬。因此，最初的成功，同时也铸就了一个框架：起点也就成了终点。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评价军事文学作品的参照系，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以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内容的军事题材文学，称之为我们的军事文学。由于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适合于表现的主题是革命战争，所以有人又称之为战争文学。

这一框架的形成，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军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平庸化。作家没有思想，他的思想早已被框定。他的全部任务就是寻找能图解这些思想的人和事。作家在这里是被动的，他的本体创作精神和他笔下人物那鲜亮丰满的个性以及所要揭示的战争谶语，统统都被那个框架收了



去。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画地为牢，必然导致思想与笔底的僵化，这是毋庸置疑的定律。

实际上军事文学作家从那时起就感到疲劳，不过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从现在的我们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上推算出前辈们有多么累。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难做到。“40个0加起来仍是0。”真正有思想的作家大都对这种简单进行了个性的抵抗，不屑于再写已经框定的东西（就连平庸的作家也知道简单的重复多么索然无味）。因此，本来是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战争生活，往往由于这个框架的“参照系”的指数而草草几笔收场。大家都抱着膀子注视着未来，企盼着一场新的战争的到来，以便给自己的作品注入几丝新鲜。且不说这种企盼违背和平人民的正常愿望，只从创作的角度看，从一条直线延伸又有多少新鲜的内涵可言？但是，所有军事文学作家几乎都做着“吃第一口”的梦，似乎谁最早涉足新来的战争，谁就摊上了该期战争文学专号的首篇。当然，闲暇时也有不安分的作家试笔，因而也有军旅文学、营区文学、心态军事文学等等应运而生，但严格说来，这些花开的再好也是侧枝上长的东西，自然没有主枝上的花朵来得辉煌。再说，离开了战争和战争历史的载体，作为军事文学来说，必然要变得苍白乃至孱弱了。试想，假若《水浒传》、《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没有战争史实作为载体，能进入历史长河流传至今始终不被波浪所淹没吗？

实际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军事文学的领域里已经出现了一些艺术和审美价值较高的作品，如：《洼地上的战役》、《柳堡的故事》、《百合花》等，有时这些作品违背了框架而接近那条“曲线”，因此在作者们受到褒扬不久，又戏剧性地受到了挞伐和批判。对这些作品的不公态度又一次电殓了悄悄生长着的作家思维。当然，当我们清除了极“左”的影响与干扰后，这些作品成为“重放的鲜花”而又享誉一时。矫枉过正，也导致了有些军事文学作者不屑于表现战争中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而片面地认为军事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全在于它的唯美性。无疑，这同样是一种陋见。

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再看看其他的现象——



革命回忆录是一种与军事文学创作关系极为密切的非文学现象。作为一夜凋零便从此冷寂的战争文学的互补，它一出场亮相便受到了青睐。作为“当事人”的老前辈们，许多人都曾充满激情而欣然命笔，写出了非常宝贵的回忆录，而这些回忆录多是有关战斗和战争的追记。从史料角度看，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是，史并不是诗。这些文章只是原始记录，并没有注入文学意义上的情感和思想，并没有对战争进行哲学意义的深层思考，按理说，只要把它们烫上金字放在写有“史料”的櫺格上就是，可是，历史偏偏把它放在了战史文学的位置上，许多人就以为战史文学不过就是革命回忆录文学。

以后，随着许多美好东西的消失，战史文学这个命题便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当我们今天把它重新提出来时，面临着不以为然的鄙夷和嘲弄。

当唯美主义成了一种公式而批判另一个纯属批判者所假定的公式时，我们同样地不以为然。

二

我们说起战史文学不能不谈到历史。黑格尔曾用线性历史观为人们解释历史和人的发展，他把历史简单地划分成几个阶段：少年由早期的东方各民族来代表，青年期是希腊时代，壮年是罗马时代，老年期即最高的成熟期则是黑格尔的普鲁士时代。黑格尔的这种图式直线历史观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进行了中国社会的变革。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包括军事文学的理论一直是运用直线历史观的理论指导我们的创作的。

当然，这种认识论也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的。

问题是现代科学发展迅猛，使我们有了可能在线式历史观之外进行思维触觉的探求。让我们注意到科学哲学的兴起，有可能发展我们的认识。这种“拿来主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不矛盾，倘若我们并不停留在困惑与骚动的起点上的话。实际上，“对于整个宇宙说来并没有线



性时间连续那样的东西，反之，时间被分解为一条互相分离的线路，每一条线路有一个序列次序，可是并没有一种超级时间把那些线路排列起来，每一线路的时间前后两端都会像沙漠中的河流一样无形消失，而并不终止于一个明确的境界点上”（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第164页）。无疑，这样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纵横比较和多层次的价值系把握。而具有恒远性价值的文化意蕴，则成为我们追求更高审美价值的热点。

线性历史观为我们引出了因果关系说，既然有发生就必然有结果。我们的文学都起劲地追求绝对的必然性，就是在神魔小说，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等小说中也大量存在。这种单元化的思维形成了我们文学的苍白。更让人感到滑稽的是，我们一些人连因果关系也不寻找，直接从结果中寻找原因：因为革命战争胜利，所以和这种战争有关的一切因素都好。实际上，这样去写战争就太简单化了。比如，有些战争按中国传统文化就很难解释。《长发》、《玄鸟》、《殷装》是歌颂商汤的武德武功的，《孟子·梁惠王》曰：“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说明老百姓翘首企盼仁义之师，而只有仁义之师才能打胜仗。这种道德伦理型的战争就很难解释今天英阿的“马岛之战”。战争有时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正义，而却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时战争的胜利还取决于偶然因素。

我们询问宇宙也不能仅用因果关系。

现代物理和数学的研究成果给我们以深思。对于宇宙，爱因斯坦说它是“一个黎曼球型空间”，它的“全部空间是有限的，同时又并不具有边界”。而数学家弗里德曼和勒梅特尔则认为这黎曼球似的空间是不断扩展的，它以“退离着的银河系的速度所示的速率扩展着”。相对论数学家用科学为我们推导出一个扩展宇宙的公式：“宇宙是没有起源的，但有在时间中排列着的，无限个可计算状态的无限序列。”从这些科学家的论述看，说凡事必定有一个最初事件，时间必有一个开始的起点，便成了未经训练的短视者。

科学给文学提供了无限个解释世界的可能性，使我们不必站在一个结果的窠臼中寻找事物发展的原因。这有利于大幅度的扩展我们的视野，



丰富我们的战史文学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面对战史文学这块领域时，1000 个人将有 1000 种观察的角度，将有 1000 种表现手段，将会有 1000 个他们自己心中的战争。

我们知道，战争的历史是复杂的，各武装集团之间，它们的背后，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立和统一。倘若片面的以今天的功利标准去简单地衡量，甚至编译和图解政治，不仅是缺乏历史责任感的表现，而且也无法创造真正的历史审美境界。

现在我们注意历史的天空时，再不是单色调纯正的蓝。我们面对这个色彩纷呈的历史，又多了一种观察方式和把握方式。我们把历史分为主动的历史和被动的历史。被动的历史就像一张白纸，等着我们去书写；而主动的历史闪闪发光，光怪陆离，它把自己的色彩投身到我们身上。我们认为这二元对立对文学似乎都有用。因为文学不等同于政治。我们坚决认为文学和政治有联系，但它又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表现在它不像政治的斩钉截铁。它应该像流体，只是会倾斜。

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历史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就会知道任何已经铸成的历史事实后面肯定还有一条或者多条并行的隐线。就像山是事实，而山的表层下的石头也是事实一样。应该引起文学的注意。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应该是历史事实后面的那条隐线。我们的文学任务在于把那条隐线揭示出来，用人类的智慧经验和审美经验将它发生生命般的律动，在我们无尽的历史长河中展示出绚丽多彩的浪花。

反思历史，站在今天所达到的思想高峰上俯瞰昨天。多层面，多角度地去追溯人类战争复杂而庞大的精神根系，牵引出难以遏止的历史沉思，在未来的军事文学造山运动中，必将有一块属于我们的高地。

三

我们该有三只眼来审视战史文学。首先，第一只眼应把视点聚焦到它的审美价值上。中国文学的传统历史历来讲究“载道”、“明理”，把文学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用来彻悟哲学、政治、伦理等道德说教的手段。文学世代相传行走在褊狭的泥泞小路上。中国的儒学编织出柔韧而又温和的网状



绳索，处处礼貌而又谦恭地限制和规范着个体行为，军事文学作家比地方作家具有更强的职业意识，他们把军人的集体观念，高度集中，令行禁止无意识地带进了军事文学领域，形成独特的文化心理。这是社会学中宗法观念在军事文学领域中的畸形投影。

我们的职业军人常自诩自己的家族为“绿色家族”，几乎所有的军人都认为部队是一个“家”。这个家族观念与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宗法制度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我国，虽然春秋战国以后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到近代，又经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但宗法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却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顽强生存下来。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为基本结构单位的。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是以家族为中介的。如果家族中有人触犯刑律是要株连九族的。家族中的人荣辱与共，利益相同。因此家族制度培养了一种顺从的奴性品德，而这种品德正符合中国宗法社会结构的需要。宗法制度极大地戕害了人的个性，使个体人格成为双重或多重人格。

长期以来，“文以载道”和职业意识干扰着我们军人作家的视线，使我们的视点不能投射到文学的审美本体上来。我们比地方作家更乐意搞“遵命文学”，喜欢搞“轰轰烈烈”。我们不会自言自语。一些时候，我们曾把没有进化的军人阴郁也拿出来把玩，把军人没有战争所引起的躁动、焦虑、青春在等待中流失的原始情感拿出来观赏，而我们的评论界却把这种青铜武士式的情感加以现代的词汇来推波助澜，称之为军人的气魄与风范，这足见我们目光的褊狭。真正的勇士，实际上常常是被动的。战争突然而至，他迫于无奈才拿起武器，从审美角度看也是如此，“被动才引起美感，而主动只引起快感”。

主动发起战争的感情，通常只能是领导集团的感情。图霸立业，自古便属于诸侯将军；我们的作品，倘若以宣扬这种情感为己任，并硬加于普通军人之身，只能是贵族化的自我表现，非但不属于超越历史的范畴，而且也脱离了当代。

我们回到审美的主旨上来，就会使我们的眼光变得深远起来。我们看今天的战争（看任何战争都一样）就会把它放在 5000 年的历史和无限远



的未来去考察它。那是很长的线上一个小小的点。我们会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正剧、喜剧、悲剧、滑稽剧、荒诞剧都会有的。我们会鄙弃许多虚妄、功利、褊狭、自私，使我们的作品充满生命的张力……

审美的眼睛法力无边，审美的作品清新隽永，肖洛霍夫的不朽名著《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如果按早框定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原则，无论如何也不配当主人公的。他算什么东西？乱搞女人，政治反动。可是伟大的肖洛霍夫偏偏选中了他。为什么？这就是把视点聚焦到审美价值上的结果。

新时期十年的军事文学不少优秀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与作者选择了独特的审美视点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认为第二只眼应该关注战史文学的功利性。因为不讲功利的文学恐怕也是不存在的。在当前以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军事文学主调还应该是去表现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民族自尊心。战史文学的功利观，当然不是去图解某种政治意图，而应当是历史的功利观。如果我们仍仅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战争，我们还会落入往日的窠臼。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功利观，是一个高层次高规格的未来学。它能凝聚民族魂魄，弘扬人类品格，一切向着未来，展示人类坚韧进化的趋势。在这样的约定下，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就有了新的含义。比如对英雄主义的理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英雄主义，它是支撑每个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民族的骨骼。但是，我们要看它们的英雄主义是否符合人类精神，是否向着未来，是否符合人类的进化趋势。索尔兹伯里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就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审视人所共知的长征的。他说：“1934年中国革命的长征不是什么长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战争是阶级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有一天，战争是会消亡的。但我认为，就是再过一万年，阶级消灭了，共产主义了，这本书对整个人类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人类需要英雄主义。它需要向宇宙空间不断地寻求和扩



展，它要生存，它和自然斗争时需要勇气，需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这种英雄主义并不狭隘，它不属于某个政治集团，某个民族主义。凡是能闪烁人类精神光彩的英雄主义，我们认为这就是宇宙意识。

苏联“军事爱国主义”的理论，对苏联军事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理论涵盖了一个历史事实：不论哪个民族、哪个时代，真正的军人对自己脚下的土地都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纯真的感情。面对法西斯德国军队的猖狂进攻，保卫莫斯科的红军近卫军可以高举沙皇时期抗击拿破仑军队的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的旗帜去战斗。这完全符合列宁提出的爱国主义的定义：人们千百年来聚集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深厚的情感。民族情感的触觉有时会超越社会形态的。近几年来，我们出现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和小说《国殇》，人们在阅读时所感到的情感冲击，可以佐证军事爱国主义在我们军人血脉里是多么汹涌。战史文学理所当然应该在摒弃其沙文主义内容的基础上研究这一理论和它的审美价值，从而进一步扩展我们的领域。

第三只眼应该注意战史文学的哲学思辨色彩。文学不是哲学，但文学离不开哲学。尤其是战史文学，牵涉到“史”涉及到历史真实性问题，而要做到这些，仅靠文学本身是很难驾驭的，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一些老同志写革命回忆录，很可能，他本身就是那场战斗、那个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他会把那件事本身叙述得很逼真，很具体，很详尽，但不一定会真实。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真实。他叙述的大部分是一个表象，一个事实。但他很难回答深蕴其内的多元化的趋势跃动。回答不出这一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就很难确定这件事本身是真实的。

审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不仅要纵向比较，还要横向比较。任何一个点，纵的横的都有一个可计算状态的无限序列，普遍联系法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观察方法之一。在对战争认识多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人放入多层次，多元化的环境中去，使作品产生震撼人心的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对战争历史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进入学者的领域，加深和扩展知识结构，丰富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底蕴。当许多老同志在回忆录中叙写1942年日寇秋季大“扫荡”的历史事件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谈起当时斗